

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互鉴和影响

首作帝

摘要：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通过文明互鉴，积极探索交流与融合的存在方式。西方经典以赞美和阐释中国文化的方式，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推动中国文化的当代构建。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经典找到了艺术的精神故乡，也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广被认知和接受。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实现了双赢：西方经典从中国文化汲取智慧和养分，开辟人类文化自信的开放路径；中国文化帮助培育西方经典的文化自信，也借此重新激活自身巨大的能量。这一切具备了逻辑创新和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西方经典；中国文化；当代构建；世界影响；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首作帝，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106；G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9.04.010

一直以来，中国和西方被视作世界历史中最重要文明轴心，源源不断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虽然中国和西方相隔万里，差异甚大，但是他们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吸收和融化，奉对方为敬畏和赞美的对象。“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1]15}中国和西方共同致力于探求不同血缘的民族所实践的真理，追求实现世界历史和人类未来的交流与融合。这既是我们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和标准，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最佳诠释和典范。黑格尔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明互鉴，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露出端倪。阿溪里斯开始了希腊世界，亚历山大完成了希腊世界。他们向往昔来自东方的文化雏形致敬，即将它在西方的成熟和造诣回馈和普及到了东方。从这时起，希腊甚至和中国“有了联系”^{[2]319}。胡塞尔也有类似的表述：欧洲文明也不过是像中国一样的经验的“人类学的文明类型”^[3]。他们强调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鉴，强调人类文明的宏观视野和开阔境界。我们注意到，在中西文明交流和互鉴的进程中，一个具体和客观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通过互相借鉴，共同获得文化自信。笔者拟从三方面对西方经典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加以论证研究：一是西方经典赞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极具深远影响；二是西方经典阐释对中国文化的构建产生巨大推动；三是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互鉴，共同获得文化自信。

一、西方经典赞美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

西方经典记录了文明的历史进程，承载和输送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理念，从而进入全人类的阅读和认可范畴。西方经典有一个极其可贵的品格，那就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唤醒

人们的记忆,追求活络流变的精神气度,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文化的真谛。我们谈西方经典的开放性,阅读和认可是最表层的现象,接纳和赞美中国文化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在西方经典看来,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厚重、规模宏大,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却没有真正显现出觉醒的意识。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相应司法制度的创立,西方经典揭开中国文化的面纱,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范畴,认真研究中国文化,高度赞美中国文化。

西方哲学家十分理性地探究和记录中国文化的起源时间,这是西方经典赞美中国文化的基础。黑格尔研究历史哲学时写道:“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圣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2]161}伏尔泰表达得更简洁和纯粹:“中国人的法律比摩西的还要早得多呢。”^[4]不管使用具体时间“三千年”“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还是使用抽象时间“早得多”,西方哲学家表现出了一种新的、严肃的科学研究的態度,这就从实践上为西方经典赞美中国文化扫清了障碍。在西方经典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茶叶、纸张、印刷、象棋、饮食、谚语、典籍等成为永不消逝的赞美对象。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指出,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纸张,“给印刷作基础而和印刷的产生同样奇妙的纸,在中国出现很久之后,方始由地下商业网传到小亚细亚”^[5]。巴尔扎克通过一对情人——大卫和夏娃的冗长对话,讲述中国纸张传入欧洲的“造纸的常识”。欧洲在中国的影响下开始生产各种纸张——葡萄纸、耶稣纸、鸽笼纸、水壶纸、银洋纸、贝壳纸、王冠纸等,然而这些纸张远不及中国纸张平滑、柔韧。当时,中国纸张是全世界最好的,完胜欧洲纸张。《幻灭》对中国纸张的这一暗示,可以理解为巴尔扎克对中国文化既往辉煌有意或无意的追忆。而关键在于,巴尔扎克将长篇累牍的“造纸常识”很突兀地插入情人之间的对话,用历史的枯燥知识替代爱情的甜言蜜语,用理性说明替代感性抒情,这难道不意味着,巴尔扎克在用心地赞美中国文化?雨果在《海上劳工》也使用了相同笔法来说明印刷、火药、大炮、气球、帆船和麻醉药等物品“在中国很早就发现了,现在还在应用”^{[6]351}。中国文化一直受到西方青睐,成为被反复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惠特曼通过诗歌《草叶集》表达这种思想,格调是现实的而非浪漫的。他认为,“远在过去,在你,美利坚之前”^[7],有中国的各种典籍和田园诗等古老的诗歌。惠特曼暗喻美国文化苍白无力,它必须温和谦恭起来,以中国文化作为学习的对象。黑格尔认为中国诗歌在全世界发展最早,贡献卓越。“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8]西方经典从时间视角力图传达这样一种思想:中国文化是存在于长期传统之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文化,源远流长,值得赞美。

西方经典赞美中国文化,使得西方人在访祖寻根的问题上打开了新的历史维度和思路。本雅明借用布莱希特的例子来阐述这种境况:“对伟大的经典作品,尤其是中国文学作品的观察向他展示出,在那里对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就是它的可引用性。”^{[9]241}布莱希特相当崇拜中国文化,创作文学作品《易经》《四川好人》问候中国读者,撰写理论作品《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论中国人的传统戏剧》向中国文学致敬。布莱希特谈到,虽然自己创立和发展了叙事剧理论,可是创作叙事剧的尝试在很早以前就有过,它开始于科学大发展时期,欧洲的叙事剧则开端于自然主义。布莱希特进而指出,中国是最早创作叙事剧的国家,“早在二千年前已经历了这个先进的形式”^[10]。布莱希特有意将自身置入中国文化,从中寻找艺术的灵感和法则。布莱希特创作的散文集《易经》中的“墨子说”模式堪称中国《墨子》语录体的翻版,戏剧作品《大胆妈

妈和她的孩子们》则把《庄子》的“忠信廉义”“材之患”等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入西方戏剧。布莱希特强调中国文学作品的“可引用性”，严格来讲，所谓的“可引用性”仅适用于学术文献范畴，之于文学创作，则有剽窃之嫌。然而，布莱希特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文学作品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的对象。通过向对方致敬，他将自己的创作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这在世界文学领域并不罕见，历史上亦有先例：普鲁塔克、厄斯塔修斯、波立提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皆是“引用”荷马的佼佼者。布莱希特相信自己完全有理由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和牵引。布莱希特的创作部分出自原创，但更多的是源自中国文化的精神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布莱希特的艺术源头来自中国文化，一种十分古老的汁液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流动。中国文化是布莱希特的精神故乡。

雨果、歌德、伏尔泰、卡夫卡等西方经典作家皆涉及直面精神故乡的情况，他们积极踊跃地加入赞美中国文化的阵营。雨果坚定不移地声明对中国文化的珍爱和保护，他以演说家的姿势热情呼吁：“到中国去看看吧！”^[11]雨果以非凡的激情鼓舞了作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心驰神往和驻足流连，他们纷纷写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不朽篇章。夏尔庞托回应了雨果的呐喊：“我很想去中国。”^[12]长江、黄河、天坛、明皇陵等文化古迹被作家赋予新的气息，它们激活了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互鉴潜能，并被吸收进西方之后的社会发展之中。弗耶当卡夫特站在万里长城脚下，以温良和恭敬的态度宣誓：“我正是你这长河母亲的一个西方后代。”^[13]弗耶当卡夫特使用了一个隐喻修辞“西方后代”，借此突出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将西方经典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里。在这样的情境下，西方经典作家对中国文化高度认同的集体行为，一时形成风潮。如果说歌德创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首诗，或多或少包含着中西文化的原生属性之间的差别；那么歌德创作《中国诗》组诗，且以《梅妃》《开元宫人》为诗歌命名，则从题目到题材皆彰显与中国文化的直接关联，把中国文化作为精神故乡并高度赞美。如此一来，歌德在进入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心态上，找到了真正的审美尊严和路径，这千古大喜便是作家自谓的“结合的良缘”^[14]。这里还有两个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故乡紧密相关的范例，以及针对它们的著名评论：一是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写《中国孤儿》，“有人竟把它宣告为原则和公式而写在艺术的大旗上”^[15]；二是卡夫卡创作《中国长城建造时》，“卡夫卡自称是在复述一个中国传说”^{[9]338}。西方作家的深层性格经受了中国文化的洗礼，当他们以语言和思想虔诚地融入其中时，这一精神故乡迹象明显被强化。在此情形下，西方经典在认真讲述本土故事之外，也痴迷和爱恋中国文化，并随之生产出实在的精神互动和关联，从而展现了人类艺术及其实践的世界影响。

西方经典赞美中国文化，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大规模地集体歌颂中国，体现了西方文明竭力适应外来文化的基本倾向，即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各个因素，直至使其为我所用。中国文化是一笔令人钦羡的宝贵财富，它对西方经典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经典正是在与作为精神故乡的中国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源泉和灵感，从而使得自己不断吐故纳新，日渐硕果累累。

二、西方经典阐释对中国文化的构建推动

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阐释，离不开两个要点：其一，和西方相提并论的中国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其二，中国文化传递的主要不是实在的内容，而是具有

世界影响的精神内涵。在西方的有识之士看来,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提供一个关于世界、自身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普遍而独特的传统镜像。它是一类具备多元性质的模型和概念,由文化功能又产生了社会和心理的功能。罗素认为,西方文化散发出一种帝国主义气味,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认识到这一区别具有极其深刻和重要的意义。“假如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适,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认亚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16]

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其社会存在的定位和评价。在西方作家看来,中国文化在亚洲首屈一指,诚如伏尔泰所言,“亚洲第一”^{[17]106};亦如托尔斯泰所言,“东方各国之首”^{[18]357}。西方经典热衷于阐释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文化地位。巴尔扎克在《农民》的开篇,以《评议报》编辑勃龙德的口吻致信纳当先生,详述了艾格庄精美细腻的景观,它是按照中国文化来设定审美标准的。“据我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得装饰的。”^[19]巴尔扎克完成小说的描写之后,加入主观性和概括性极强的论点,对中国的审美艺术进行阐释,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社会认为人口的数量与文明的进步成正比。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阐释了中国养活世界上最多人口和拥有最强文明的奥秘:“科学经过长期摸索,今天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的粪便。说来令我们惭愧,中国人比我们知道得早。”^[20]雨果从科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文化领先世界,使得“粪便就是黄金”的理念深入人心,创造了现代小说的典范。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西方经典的变化并不只停留于简单的形式改变,更深入至思想革新。西方经典始终与中国文化联系着,在对中国文化的不断阐释中给予其最高评价,努力改变之前对其一无所知甚至是错误认知的奇怪现象。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推崇,随着科学社会的来临得到了普遍承认。“一般地说文化上的进步,特殊地说科学上的进步,都使较高级的思维关系逐渐显露,或至少将这些关系提高到更大的普遍性,从而引起更密切的注意。”^[21]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深入阐释和进步认知,既是合乎时宜的结果,也是时代精神的结晶。它改变了西方社会唯我独尊的文化傲慢姿态,传递出拥抱人类文明的信号。

在对中国文化不断阐释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经典竭力打造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打造涉及中国形象的维护和构建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进行阐释的形象化和具体化表现,创造了以中国形象作为西方参照的传统镜像。维护中国形象主要体现于西方经典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尊重,对中国政治平等和文化平等权利的捍卫。雨果在《海上劳工》中反对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大声疾呼停止毁坏圆明园等文化遗产的野蛮行径。“在上次战争里,从中国皇帝的宫殿内抢出来的一幅丝绣,上面绣着一个鲨鱼要吃鳄鱼,鳄鱼要吃蛇,蛇要吃鹰,鹰要吃燕,燕又吃飞蛾。”^{[6]344}雨果在此借中国文化进行箴言式阐释:肉食者就是埋葬者,它们全部在自掘坟墓,针对中国文化的侵略皆是引火烧身。西方经典描写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却以失败告终,其目的是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完整性。托尔斯泰指出西方侵略者最终不得不解除武装,其实是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忍耐智慧。“儒家,教人勿用武力;道教,宣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忘我与博爱。”^{[18]358}西方经典强调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是坚忍,正是坚忍使得中国在遭受外敌入侵时,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愈力。西方经典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西方国家所谓的“开放”,即“开放”不过是西方国家对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家的侵略。与此同时,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魅力也赞赏有加。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具有乌托邦性质,“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

能发展达到的最高点”^{[1]158}，它永远吸引着外人趋之若鹜、纷至沓来。

西方经典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体现于将中国打造成“东方乌托邦”。这不仅赋予了中国形象以丰富性，而且赋予了西方乌托邦以丰富性。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刻画了一个以中国为参照，芬芳、绿色的乌托邦天堂。“那充满短暂快乐的无邪天堂/难道这比印度和中国还遥远？”^[22]在波德莱尔看来，哪怕虚构的乌托邦都要比中国更容易接近和实现。这是一个绝妙的对比或者反讽：中国在西方经典中以无穷的魔力成为作家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向往，西方国家被暗暗地贬抑。西方经典想象出来的“东方乌托邦”式的中国是不存在的。笛福为他最喜爱的人物鲁滨孙安排了一趟永世难忘的中国行旅。鲁滨孙看见中国的房子全部是用瓷建造的，称之“瓷屋”，人间罕有、天下绝无。笛福不吝笔墨地赞美“瓷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整个房子就好像烧过的瓷器一样，变硬发光。整个呈白颜色，相间显露出蓝色的花，就像在英国见过的一种中国大瓷器，很好看。屋内的墙都是用带有花纹的瓷砖砌的，这些砖也是用瓷泥烧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像我们的长方形的活字盘。砖的颜色各种各样，有的还嵌有金子。他们用一些砖拼成花样，拼花的技术很好，接缝处又填上瓷泥，所以不易看出缝子来。”^[23]笛福没有访问过中国，他凭借想象力为西方读者虚构出美轮美奂的建筑，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持久而热切的渴望。瓷器后来确实成为中西较量的焦点器物，但是“瓷屋”更多体现的是西方经典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书写，在本质上与波德莱尔的“无邪天堂”并无差别，皆为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打破常规的阐释。

西方作家对“东方乌托邦”的渴望之情渗透于西方经典中，中国形象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成为西方社会的传统镜像。歌德创立了不朽的中国形象。在歌德笔下，中国不再是被殖民者瓜分的羸弱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国家被带进了世界大家庭。歌德把中国视作造福四海八荒的“东方乐土”。他以充满魅力和令人兴奋的笔调写道：“无论向何处窥望/仍见我东方乐土。”^[24]歌德显然把中国形象置于西方经典的视域内，“我”“东方乐土”寓意作家与中国合成一体。波德莱尔是最向往“东方乌托邦”的作家之一，他刻画了一个幸福的理想乐土、乐园，称之为“西方之东方”“欧洲之中国”。波德莱尔无限憧憬地写道：“那里一切都美丽、富饶、宁静、适当，那里幻想建立和装饰了一个西方的中国，那里生活充满了甜蜜，那里幸福与寂静结合。应该去那里生活，应该去那里死亡！”^[25]波德莱尔沿着中国文化的线索，重组东西方社会版图，将二者的地位和身份置换，“西方的中国”取代“东方的巴黎”，中国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象征的层面皆远高于西方。中国是被美化和再造的乌托邦，西方则是“忧郁”和“地狱”的代名词。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借用卢斯喜欢中国人这个事实，来传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我只是刚好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让人满意。”^[26]塞林格在其小说中表明了自己接受中国文化的态度和立场。这是他在批判美国道德堕落和精神“荒原”的现象之后，找到的可资参照和值得托付的文化镜像。这种简单直接地走进中国文化的方式，符合美国当代年轻人洒脱不羁的个性特征。海涅则以十分严谨细致的参差笔法，将中国形象和欧洲思想之间的冲突讲得幽默诙谐、趣味横生。“你们知道中国吧？这是个风筝和瓷壶的故国，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古董陈列室，周围有道奇高的长城，城上有成千上万的鞑靼哨兵。但飞鸟和欧洲学者的思想却越空而过，当他们在那里四处看得心满意足，重又返回这里时，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这个奇异国家和奇特民族的最稀奇的事物。……为了憋住笑声，他们就拉出一副严肃、滑稽的怪相。”^[27]海涅具有批评家的可贵勇气，把读者带进直面中国文化的语境内，毫不留情地嘲讽了欧洲思想家。他们见多识广却

以动物思维行事,“怪相”是作家用来针砭和否定他们的判词。西方经典着迷于参照中国文化来审视西方社会,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精髓并使之服务于西方社会,体现出其文明互鉴的高度自觉,是人类的伟大创举之一。

三、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互鉴的文化自信

西方经典频繁赞美、反复阐释中国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以文明互鉴的方式理解自己、提高自己。这里遵循的不是自然的联系,而是社会的互动,寄寓了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换言之,中国文化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为西方经典提供了资源和动力。“一种成熟、健康、海纳百川,与世界文明相拥相携的文化自信,它的最高社会表征,就是尊重自己,也尊重世界!”^[28]西方经典最了不起的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希望和自信。霍布斯曾经断言:“常存的希望称为自信。”^[29]由于西方经典的推崇和促进,文化自信的边界和影响从中国延伸和扩散到西方,向着世界影响的高度攀升。

西方经典的源头追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文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新的模仿对象,成为影响世界的一支新力量。克里斯托弗·道森一语道破:那些较为次要的或者低层次的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进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中国文化则大不同,“因为在那里有着一个伟大的世界文化的模型”^[30]。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保持着至尊的纯洁性,从未被取代。莱布尼茨强调,耶稣会士曾婉转地暗示过中国人也有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圣者,中国文化完全可以为西方社会提供进步和发展的借鉴。中国文化是有利于西方社会的,所以莱布尼茨郑重其事地告诫:“在罗马的人们不要对一个最伟大的民族未经了解就想加以谴责是更有道理的。”^[31]爱默生一直推崇中国诸子百家的人格魅力和思想修养,这就是中国文化为基督教输入的隐微美德的证据。“欧洲的神圣冲动一直受益于东方天才。这些神圣的诗人的话,凡是心智健全的人发现都能同意,都是真言。”^[32]这是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西方经典向来以基督教作为传统资源,而基督教必须从中国文化获得启示和认可,即是中国文化值得自信的最佳表现。

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精英视中国文化为最出众的选择,不论过去和未来,都是基督教不可比的。他们甚至认为,基督教的教义部分地来自中国文化。伏尔泰敏锐地指出,中西教义虽有一定的关联,却分属最具公开性和隐秘性的两个极端。“他们的教义的基础就是中国的儒家所一贯宣扬的思想。但是中国的儒家的崇拜是公开的,而欧洲一位论者的崇拜是秘密的,每人各自崇敬自己的上帝,不拘泥于参加公开仪式。至少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甚少的被称为一位论派的人举行集会。然而这些人自称是原始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位论者。”^{[17]410}这里委实无意争辩孰是孰非,但是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影响力已然昭示,中国文化具有启蒙的性质,西方文化可以从中受益。黑格尔曾批评西方教义:“如果真正有必要,只须能办到并且保持一个神存在的信仰,或者甚至能创造一个神存在那样的信仰,便算满足,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贫乏,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个时代竟以赢得一些浅陋的宗教知识为无上收获,并且在教堂的神龛中退回到供奉千百年前在雅典即已供奉过的生疏〔异己〕的神!”^[33]托尔斯泰认为,基督教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养料。“耶稣的教义,对我来说,只是我们从埃及、以色列、印度、中国和希腊的古代文明中吸收的美妙教义中的一种。”^[34]托尔斯泰是孔子、老子和庄子等中国古代先贤的信徒,把他们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

西方知识分子精英对西方宗教的自闭和保守进行了猛烈鞭挞，中国文化得到赞美和推崇。这种情况令人惊讶。西方宗教的教义是往后倒退的，借“原始基督教徒”和“雅典的神”来标榜自己的身份，从而无形中中断了自身开放和创新的路径，于是，只得求助于中国文化，从中汲取万象更新的可能。

西方经典指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海纳百川的，其往往用“巨”“大”一类的形容词来描述中国文化的自信。罗曼·罗兰通过比喻从宏观上称之“中国的巨人般的身体”^[35]。西奥多·德莱塞借用拟人表达得生动形象：“关于中国的天龙大神，有人曾经这么写道，它开始时就在全世界吞下去了。”^[36]这样栩栩如生的修辞手法，实则把中国文化提升至囊括宇内、自由无边的至高境界，是别具一格的肯定和赞美。西奥多·德莱塞在《巨人》中刻画了一批崭新的当代女性“巨人”，意义重大而深远。西奥多·德莱塞笔下的新时代女性“巨人”是对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等西方传统男性“巨人”的颠覆，是一种跨越式尝试和挑战。小说中有个细节意味深长。垄断资本家法兰克·阿吉龙·柯帕乌喜欢上了丝黛芬妮，觉得她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注定将有远大前程，夸赞她的手镯和耳环。丝黛芬妮答道：“那些碧绿的玉石和那块淡淡的、脂肪似的白玉石！我看得出来，在中国式的背景中这些东西会显得多么美啊。”^[37]丝黛芬妮不像一般妇女，轻而易举就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自信。“巨人”的措辞和隐喻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可以说是惊人地匹配，《巨人》的经典性也由此构建，它也是对拉伯雷《巨人传》的继承、创新、发展。

中国文化为西方经典提供了参照视角，也彰显了自身的自信。这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歌德通过《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结尾的“格言集”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中国古代文化永远是珍品，“让自己并让世人去了解它们，这是一件大好事”^[38]。如果说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还是单方面的输出，那么以歌德为代表的西方经典作家主动去了解和學習中国文化，则显示双方已经达成了交流和沟通，实现了真正的互鉴互利。赫尔曼·黑塞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置的大师，他慷慨激昂地宣誓新信仰：“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使我把孔夫子和苏格拉底作为兄弟相提并论，而老子的隐退智慧及其生气勃勃的神秘主义对我个人具有强烈影响。”^[39]赫尔曼·黑塞有一个“中国角”书房，摆放着《论语》《庄子》《列子》《孟子》《易经》《礼记》《道德经》《吕氏春秋》等典籍。赫尔曼·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借主人公克乃西特的角度，赋予《易经》以熔铸世界文化于一炉的象征意义。“很久以前他在研究一条有关《易经》的注释时就曾想到，书中这些规则富于神秘气息的排列组合和含义，似乎显示出一种特别令人喜悦的可爱象征，表达了世界上的人类与宇宙之间的组合关系。此外，克乃西特还发现，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屋传统精神与自己这里传统的官方与学术的抽象思辨精神，有着惊人的内在相似之处。”^[40]赫尔曼·黑塞的想法非常超前，实现了西方经典和中国文化的无缝对接，闪耀出人类文明体系内文化自信的最璀璨光辉，表现出真正的审美尊严和文明范式。叔本华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和科学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似乎是犹太教神秘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理哲学以及中国《易经》哲学思想的渊源”^[41]。这种渊源和联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前，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和有影响力。西方经典在创造性地利用中国文化来夯实人类文化、获得希望和自信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将自己和中国的世界影响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和新境界。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唤醒和引用，以及西方经典和中国文化互鉴所产生的世界影响，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曾艳兵说过：“西方经典如果要获

得中国文化语境的认同,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它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读、误译、重写,甚至改写。”^[42]因此,西方经典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文化渴求和心理期待,便积极将中国文化纳入写作和借鉴的范畴。随着交流的普及和深入,西方经典参与到中国文化的构建当中,中国读者对西方经典的认知也越来越接近西方读者。这就从本质上解决了交流的难题,既让彼此实现了互惠互利,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西方经典把中国文化当作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镜像,体现了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智慧。西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代表了人类文化构建的新路径、新方向。这一切皆具备了逻辑创新和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 [1] 卡尔·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M].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2]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王造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3] 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M]. 张庆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17.
- [4] 伏尔泰. 哲学通信 [M]. 高达观, 徐仲年,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66.
- [5] 巴尔扎克. 幻灭 [M]. 傅雷,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108.
- [6] 雨果. 海上劳工 [M]. 罗玉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 [7] 惠特曼. 古老的诗歌 [M] // 惠特曼. 草叶集: 下卷. 赵蕤,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823.
- [8] 黑格尔. 美学: 第3卷 [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31.
- [9] 本雅明. 经验与贫乏 [M]. 王炳钧, 杨劲,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 [10] 布莱希特. 在科隆广播电台的谈话 [M] // 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论戏剧. 丁扬忠, 张黎, 景岱灵, 等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129.
- [11] 雨果. 我生命的附言 [M]. 赵克非, 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3: 60.
- [12] 夏尔庞托. 我很想去中国 [M]. 江伙生, 译//倪维中. 孩子.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268.
- [13] 弗耶当卡夫特. 在万里长城脚下 [M]. 江伙生, 译//倪维中. 孩子.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282.
- [14] 歌德. 中国诗 [M]. 钱春绮, 译//歌德. 歌德的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304.
- [15] 雨果. 美为真服务 [M] // 雨果. 雨果美文集. 柳鸣九,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116.
- [16]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上卷 [M]. 何兆武, 李约瑟, 译. 商务印书馆, 1963: 490.
- [17] 伏尔泰. 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 下册 [M]. 谢戊申, 邱公南, 郑福熙,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8] 罗曼·罗兰. 名人传 [M]. 陈筱卿, 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 [19] 巴尔扎克. 农民 [M]. 陈占元,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11.
- [20] 雨果. 悲惨世界: 下卷 [M]. 潘丽珍,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330.
- [21] 黑格尔. 逻辑学 [M]. 杨一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6: 4-5.
- [22] 波德莱尔. 恶之花 [M]. 郭宏安, 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173.
- [23] 笛福. 鲁滨孙飘流续记 [M]. 艾丽, 秦彬, 译.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190.
- [24] 歌德. 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M]. 杨武能, 译//歌德. 歌德的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307.
- [25] 波德莱尔. 巴黎的忧郁 [M]. 郭宏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49-50.
- [26] 塞林格. 麦田里的守望者 [M]. 孙仲旭,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147.
- [27] 海涅. 论德国 [M]. 薛华, 海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13.
- [28] 秦晓鹰. 文化自信: 尊重自己, 也尊重世界 [N]. 中国青年报, 2019-02-11 (2).
- [29] 霍布斯. 利维坦 [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39.
- [30] 克里斯托弗·道森.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M]. 长川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40-41.

- [31] 莱布尼茨. 人类理智新论 [M]. 陈修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606.
- [32] 爱默生. 神学院演讲 [M] //爱默生. 爱默生散文选. 蒲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339.
- [33] 黑格尔. 小逻辑 [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67.
- [34] 罗曼·罗兰. 托尔斯泰传 [M]. 黄艳春, 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3: 166.
- [35] 戈宝权. 罗曼·罗兰和中国 [J]. 法国研究, 1986 (4): 3-10.
- [36] 西奥多·德莱塞. 谈我自己 [M]. 主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44.
- [37] 西奥多·德莱塞. 巨人 [M]. 韦丛芜,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234.
- [38] 歌德.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 [M]. 张荣昌,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368.
- [39] 赫尔曼·黑塞. 我的信仰 [M] //赫尔曼·黑塞. 黑塞散文选. 张佩芬,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251.
- [40] 赫尔曼·黑塞. 玻璃球游戏 [M]. 张佩芬,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65.
- [41]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M]. 石冲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08.
- [42] 曾艳兵. 跨文化视野中的西方经典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7 (4): 131-137.

Western Classics and Chinese Culture: Mutural Reference and Influence

Shou Zuodi

Abstract: Western classics and Chinese culture actively explore the existence mode of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mutual referenc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Western classics promote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by prais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western classics have found the spiritual hometown of arts and shaped a brand-new Chinese image, which has made Chinese culture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Western classics and Chinese culture have achieved a win-win situation; western classics acquire wisdom and nutrients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create an open path for human culture's self-confidence; Chinese culture helps to cultivat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western classics, thereby reactivating its enormous energy, all of which hav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ogical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western classics; Chinese cultur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world influe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收稿日期: 2019-05-06; 责任编辑: 陈鸿)